

自由同盟时期缅甸华人社会地位探析

范 宏 伟

摘 要: 1948~1962 年是缅甸政党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的华人政治权益无论是同殖民时期还是后来的军政府时期相比,都得到了最好的保障。华人的参政权所受限制不多,出版、集会、结社等权益也基本得到了维护。华人能够获取这些政治权益,有诸多变量在起作用。华侨华人对缅甸独立的态度、这一时期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冷漠是影响其获得政治权利的主观因素。从客观环境来说,有自由同盟时期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金三角”问题的影响、华印两族和缅甸人不同关系的影响等方面。

关键词: 缅甸; 华人; 政治权利; 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 K 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03)02-0095-08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缅甸华侨华人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前国内对战后缅甸华人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教育方面,对其社会地位则鲜有论述。对华人在居住国社会地位的考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多因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华人拥有政治权利的角度,来对此做一粗浅的探讨。文中所论自由同盟时期,是指缅甸独立后 1948~1962 年由政党反法西斯同盟执掌政权那一时期。

一、缅甸华人的公民权

1948 年 1 月 4 日缅甸的独立,是缅甸华侨华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既一定程度上给华人政治生活带来了机遇,又释放出缅甸民族主义,给华人政治权益造成了一系列的冲击和影响。

国籍是确定一个人是否成为某一国家成员的法律身份或资格。具有某国籍的人才成为某国的公民,他才能依法享受该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首先考察华人的公民权问题,是了解其拥有政治权利的逻辑前提。

作者简介: 范宏伟,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缅甸独立后,侨民归化政策从殖民时期以出生地为主要原则的做法,转为以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入籍政策,华侨取得缅甸公民资格开始受到限制。1948年1月4日开始生效的《缅甸联邦宪法》规定具备以下条件者可成为缅甸公民:(1)父母现为或原为缅甸原住民者;(2)生于缅甸,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现为或原为缅甸原住民者;(3)生于缅甸,父母现为缅甸公民,或可以当然成为缅甸公民者;(4)生于英联邦,在1948年1月4日或1942年正月一日以前十年中,曾在缅甸居住8年以上者。^①

根据上述第一、二条规定,具有缅人血统的华侨、华裔可以当然地获取缅甸公民权。第二、四条规定表明,纯中国血统的华侨必须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侨,而且父母已经入籍,或在英属领地出生,并在缅甸有8年以上居住历史的人才可入籍。这些规定,对华侨来说实际上并不苛刻。因为从1931年的缅甸人口调查来看,在缅甸境内出生的华侨人数已占华侨总数的56%。^②而且华侨入籍也没有语言考试、习俗等限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自由同盟时期华侨入籍并不积极。据统计,到1953年7月31日为止,入缅籍的华人有1,223人,到1960年7月31日为止,入籍华人有4,579人。^③到1961年时,入籍的华侨有6,279人,没有入籍的18岁以上的华侨有91,156人。^④

二、缅甸华人的政治权益

拥有、行使政治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华人成为当地国公民后,享有多少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我们了解其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依据。

早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时期,一些华人华侨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组织,还有一些参加了缅甸民族主义者的抗日斗争。因此,缅甸独立后这些华人得以入主缅甸政界高层,或成为公务员、军官。此外,独立前缅甸文官职位几乎全为印度人垄断,战争中印度人大量返回印度,战后缅甸政府禁止这些印度人重返缅甸,许多华人因此得以取代了他们以前占据的管理职位。^⑤

缅甸独立后华人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7年《缅甸联邦宪法》第49条规定,联邦之公民,其本身或其父母出生于缅甸者,可以竞选总统。^⑥第142条规定,可以当选为最高法院法官者除了符合第49条规定外,已成为缅甸公民五年者也有资格。^⑦联邦宪法的这两条规定并没有像它在界定缅甸公民资格时那样强调血统主义原则,因此华人可以不受是否有缅人血统的限制而参选。此外,宪法第76条规定:“凡公民年满21岁,依本宪法或法律不在丧失能力或剥夺资格之列者,得为国会议员。”“凡公民年满18岁,依法律并不丧失资格,且符合国会选举法之规定者,对国会任何一次选举皆有选举权。”该条款所说没有“资格”的人是指宪法74条规定的,外国公民、侨民、心智不健全的人、效忠外国的人及破产者、犯罪分子等人。^⑧因此,华侨入籍后只要表示效忠缅甸,就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并没有种族、血统的歧视和限制。1949年,仰光市议员选举中,华区可选出一个议员。邱贻厥、邱清泉、叶亚发三人参加竞选,华商商会会长邱贻厥最后当选。^⑨

独立前,缅甸华商商会作为缅华社会的最高领导组织,在华人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华商商会可以选出一名代表出任缅甸议会议员,殖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也大都通过华商商会在缅华社会贯彻执行。缅甸独立后,它在华人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如50年代,仰光高等审判厅每年都会请华商商会委派合适人选出任陪审员。^⑩缅甸当局每年还请商会摊派代表担任缅甸劳工局、工业局、消防局、印刷局、统制局、海关、中央产科医院、公立医院、盲人院、养老院、微菌病院、麻

风病院、疯人院、动物园、获释囚犯救济会等十五个单位的顾问或委员(管理委员会)各一人。¹¹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权利,既是公民关心国家大事、表达自己政治见解和愿望的自由,又是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基本权利。缅甸独立后,华侨华人拥有兴办华文报刊的权利,出版者只要向当局注册登记,领取出版执照即可。这一时期缅华社会相继创办的报刊有《中华商报》、《华青周报》、《生活周报》、《亚洲日报》、《自由周报》等十余家。¹²由于人才、资金、发行量等诸多问题,有的报纸存在时间很短,到1959年缅甸共有华文报刊8家。¹³

缅甸独立后,当局对华侨华人的结社活动并未加以干涉,因此缅华社会社团组织得以进一步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47年成立的“缅甸华侨店员联合会”,它在瓦城、卑谬、纳不打、瓦溪码等地设有分会,1951年会员达2,000余人¹⁴。1949年4月22日成立的“缅华教师联合会”,1952年它就拥有会员450余人,约占全缅华侨教师的50%。¹⁵1959年会员增至1,000多人。¹⁶“缅华学联”1949年成立,1952年即拥有27个单位会员和千余名个人会员。¹⁷“缅华工友联合会”1949年成立,第二年会员就达657人。¹⁸据统计,1951年仅仰光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就有235个,¹⁹到1958年时缅华社团组织达到548个。²⁰

三、影响华人政治权益的主观因素

缅甸独立对华侨来说,意味着生存发展的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种质变中华侨是如何把握历史发展脉搏的?如何为自己在新成立的国家中定位的?以及质变在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政治定位后是如何反应的?弄清楚这些问题,是我们考察影响自由同盟时期华人政治权益的主观因素的题中应有之义。

1. 华侨华人对缅甸独立的态度

发端于清末的华侨民族主义经抗日战争的刺激而达到顶峰。缅甸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达了其对中国的全面政治认同。战后英国重新占领缅甸时期,缅甸华侨依然保持这种认同,这导致他们对缅甸独立斗争缺少热情和参与。其次,缅甸华侨对缅甸独立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并不清楚,对于侨民和公民在殖民地缅甸和独立的缅甸的不同情景下,生存发展空间的异同没有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迷茫、不明确的利益导向也导致华侨华人没有组织起来,去参与制宪建国运动。正如理查德(Richard)先生所言,战后东南亚的华人在各种冲突力量之间,采取观望态度,更明显关注的是秩序的重建和一个能够保证他们经济利益的稳定的政府。²¹

大多数华侨华人在缅甸制宪建国过程中旁观者的自我定位,使他们丧失了为华族争取政治权益的大好机会。1948年开始生效的《联邦宪法》对掸、克钦、吉仁等少数民族在议会中的席位、内阁成员的分配都作了明确的说明,而对华、印外来少数民族的权利没有任何关注。在缅甸政府权力结构及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华族没有应有的政治权利。虽然自由同盟时期当局对华侨华人态度较为温和,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公民权利的最根本体现和保证。华族的基本权利如果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而将其寄托于执政者的仁慈宽厚,这对于维护华人的政治权利无异于隔靴搔痒。缅甸独立后华族利益被漠视,固然主要是由于当局立场所致,但华人华侨在建国制宪过程中旁观者的角色,没有积极参与其中,去影响决定他们前途的缅甸决策者的做法,也是不容忽视的。

2. 自由同盟执政时期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

如前所述,缅甸《联邦宪法》和《国籍法》对公民权资格的规定,对华侨来说并不苛刻,许多华侨有资格入籍。但这一时期,华侨入籍的热情并不大。除了由于入籍手续繁杂、当局宣传不够等因素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华侨自身。

华侨入籍一般有两点要权衡,一是对祖籍国的效忠问题,一是对自身利益的取舍。1950年中缅建交,中缅邦交的正常化为缅甸华侨与新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创造了外部条件。1951~1957年,缅甸社会每年都要组织华侨回国观光团回国访问,每次都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款待,并被安排去上海等大城市游览,参观各地的厂矿。新中国和平建设的成就最大限度地展现在他们面前,极大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而中国政府也要求他们回去后把祖国的建设成就作充分介绍。因此,他们返回缅甸后,其所见所闻和感受在缅甸社会中具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种效应会进一步强化华侨对中国的向心力和政治认同,同时也减缓了华侨归化当地的趋势和削弱对公民权的诉求。台湾不时也有类似的活动来吸引支持它的华侨,其效果与上述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一时期的缅化政策对缅甸社会各阶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以华侨资产阶级受影响较大。所以,入籍最早、比例最高是华侨资产阶级。华侨工农和大部分小资产者在缅化政策下仍有较大的生存发展空间,所以他们在经济利益与政治认同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往往最终选择了后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那些入籍的华侨资产阶级对缅甸公民权的诉求主要着眼于经济利益,华人公民权的问题实际是经济利益问题。在缅甸民族主义政策的压力下,华侨资产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财产、企业,不得不加入缅甸籍,而不是热衷于政治权利、人格尊严的追求。

3 缅甸华人的政治冷漠

自由同盟时期的缅化政策虽促使一部分华侨相继入籍,但这部分入籍的华人并没有积极参与。如1949年2月,仰光市议员竞选活动中,华区有2,300多华人有资格参选,但只有三人参加竞选。²²造成华人政治冷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认为它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民族政治心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²³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教化和高压下,中国人民大众长期以来缺乏民主精神。在国民的政治角色意识中,治理国家只是皇帝百官的事,自己只不过是服从为天职的小民。因此,中国人的这种政治思维模式外化为政治行为方式时,就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疏远。

而且历代华侨移居海外“乃是出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他们在居住国受到压迫时虽也进行过一些消极的抵抗,但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积极的政治活动。²⁴华侨移民海外的初衷和异国的生存情境促使华侨远离当地政治。缅甸侨领徐四民对此曾总结说,远离当地政治“是一百多年来华侨在海外为求生存而养成的一种本能和良好传统。”²⁵

缅甸独立后,一些华侨虽然归化入籍,但他们依然游离于当地主流政治之外。政治文化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它便表现为人们长期的共同政治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缅甸独立初期,华人虽然开始在政治上效忠于当地,但他们仍对中国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心理仍然在华人身上发挥作用,决定着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华人法律身份的改变并不预示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心理随之变化,滋生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出于经济利益而入籍的大多数华人,还是囿于尽量不涉及政治活动的传统,对当地政治表现冷漠。“在商言商”,维护其经济利益,仍是他们最基本的政治角色期待。

在此,我们还可以借鉴达尔提出的分析政治冷漠的一些变量,为我们探讨其政治冷漠增加若干解释力。达尔认为影响公民不愿介入政治的原因有:介入政治的报酬价值比从事其它活动的报酬要低;个人政治效能感弱:不介入政治,结局也会令当事人满意;感觉知识有限,不能有所作为;遇到的障碍越大越不会介入政治。²⁶这些导致公民政治冷漠的变量在缅甸华人身上体现较为明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缅甸的华侨华人同东南亚其它国家相比,人数少而且比较贫穷。20世纪50年代的缅甸社会,资产阶级占6%,其余为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分子。²⁷因此,当时缅甸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大众,华侨入籍后首先面临的还是谋生立业的问题。社会生产力只有大大发展了,人们为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时间大大节省后,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所以,缅甸华人缺少支撑其介入政治的经济基础。

此外,缅甸政治文化内涵之一是非政治倾向和宿命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是:政治是一种罪恶和祸害,是五大敌人之首(其它四种为水、火、贼和恶人)。²⁸缅甸人对政治的这种态度和认识,使其对从政的人缺少好感,大多数缅甸人“逃避政治,避免麻烦,至少对政治和国事采取冷漠的态度。”²⁹在这样的政治舆论环境下,华人参与政治,经济上没有好处,而且人格上还有蒙受耻辱的危险。所以,对大多数缅甸华人来说,介入政治往往会得不偿失,这使华人缺乏足够参与政治的驱动力。其次,公民要参与政治还要具有相应的政治素质,掌握有效参与所要求的政治知识和技术。一般来说,受过越高教育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可能性越大,而知识水平较低的人获得有关政治信息的机会就越少。就缅甸华人而言,他们要想参与当地政治,熟练地掌握缅甸语是先决条件。根据缅甸教育部统计,193,594名华侨中,认识缅文的有61,718人,占31.88%,文盲有131,576人,占总数的68.12%。³⁰

所以,华侨中认识缅文的比例是很低的,而且上面的统计还只是以语言认知为标准,这种标准对于参与当地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华侨入籍后具备参与缅甸政治能力的人实际上会更少。那些文盲由于缺乏基本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对国家政治没有明确的认知和感觉,也认识不到自己对政治体系可能施加的影响和应当承担的义务,导致他们政治自信心低。因此他们对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公正、合理的待遇的期望值就低,对政治体系的态度就消极、被动。

再次,公民参与政治的必备素质的欠缺,会导致个人政治效能感的减弱。一个人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信心有赖于许多因素,但如果那些缅甸华人连最基本的定居国的语言、政治常识都不具备,势必会减少其有所作为的机会。这样他们也就愈加没有勇气和信心,去获取政治信息和表达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对政治无知的更加无知,公民的政治能力和警惕性进一步下降。总之,缅甸华人对当地政治的冷漠虽然情有可原,但华人仅着眼于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缺乏政治热情,这种政治冷漠势必会催化政府漠视华族少数民族的利益和要求。

四、影响华人政治权益的客观因素

华人固然有争取应有政治权益的权利,但作为移民其命运还主要掌握在执政的原住民手中。所以,对华人政治权益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局的政策和态度。缅甸独立后,缅甸民族主义高涨,但这一时期缅甸民族主义表现较为温和。当局虽也实行了一些缅化政策,但它主要集中在某些经济领

域。在选举政治中也没有特别的限制,华人在结社、出版、言论等方面的权益也基本得到了保障。促使缅甸政府给予华人上述政治权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1948~1962年缅甸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独立后的缅甸一直多灾多难,缅甸历史学家貌丁昂总结这段历史曾说:缅甸“从1948年到1950年这一时期,危险来自武装反抗。1951~1956年,危险来自日益恶化的经济,1957~1958年,危险来自政治分裂。”³¹

缅甸独立后两个月,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内战。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反政府武装相继揭竿而起。虽然到1951年大规模的内战被平息,但自由同盟时期反政府武装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因此,卢西恩称缅甸独立以来经历的叛乱比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都多,是一个经受着“多姿多彩”叛乱的国家。³²自由同盟执政的十多年,缅甸的经济也一直没有起色。1956年,缅甸的GNP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直到1963年缅甸人均GNP仍然比战前水平低10%。³³

缅甸独立后虽然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由自由同盟独掌政权。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多个党派、团体和个人组成的联盟。它复杂的联合,经常导致其内部政见不一、出现分裂,“这种情况引起的组织之间的竞争超过了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³⁴1958年,自由同盟分裂为“巩固”和“廉洁”两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

自由同盟时期,少数民族叛乱、经济恶化、政治动荡问题一直危及着缅甸的存亡。缅甸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特别是“缅甸一独立就开始的民族和政治分裂,迫使那些新的国家领导人们不得不用他们的全部精力来挽救联邦。”³⁵这些问题转移了新执政者的视线,淡化了外来移民问题。所以这一时期缅甸政府还无暇系统地制定出针对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政策,这与缅甸独立后国内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

其次,“金三角”问题的影响。1950年2月,一些国民党残军逃入缅甸,驻扎在中缅和泰缅边境地区。国民党残军不仅侵占缅甸领土,而且勾结叛军,帮助他们训练军队,供应他们武器。期间,残军还不时进攻、骚扰云南边境。因此,“金三角”的国民党部队成为缅甸国内外安全的重大隐患和祸源。特别是他们对云南的进攻,令缅甸当局非常不安,“特别担忧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对国民党部队引起的这场危机采取行动。”³⁶缅甸认为这样有可能会引发美国、台湾介入的世界大战,缅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但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对此缅甸总理吴努1954年访华时曾感慨地说:如果中国不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缅甸就很可能成为朝鲜第二或者印度支那第二。³⁷东南亚历史专家卡迪在论及这一段历史时也说,“在五十年代中,红色中国并不利用国民党在缅甸东部掸邦进行的挑衅,仰光对此是感激的”。所以,缅甸自战争以来决心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其做法是克制自己不去虐待华侨,”力图避免使其国土再成战场。³⁸自由同盟时期,“金三角”问题成为促使缅甸同新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缅甸当局对华人华侨态度较为温和的一个推力。

再次,华、印两族与缅甸人不同关系的影响。卡迪曾说东南亚各族“一般对印度移民比对中国移民更有强烈的厌恶感。”³⁹这种情况在缅甸应该说更为明显和突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已开始前往缅甸。中缅两国的长期交往,两国人民在语言、人种、宗教上的类似,使得缅甸的华侨华人和原住民相处较为融洽。缅甸人亲切地称华侨为“胞波”,即亲戚的意思。所以,缅甸的华侨华人和缅甸人的亲和力是缅甸其它任何外侨所不能比拟的。

同华侨相比,印度人则不容易同化于当地。他们一般保持自己的服饰,也不大与当地通婚。⁴⁰

“许多缅甸人都不把入籍的印度人看作是缅甸人，他们讨厌印度人的服饰、职业、宗教和生活方式。”⁴¹ 华、印两族和缅甸人的两种不同民族情感和心理距离，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华族所承受的缅甸民族主义的压力。1962年，缅甸陆军总司令旺枝准将在华人春节娱乐广场开幕式上称：“我们对居住在缅甸的中国人，对他们一百几十年来对缅甸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工作建设于斯。因此，我们从来不把居住在缅甸的中国人当作普通外国人看待。”⁴² 旺枝的这种表示就是上述中缅两族亲善的一种表现。相比之下，“印度人无论在公民权、公务员职位、相关规则的适用、许可证的发放等问题上会特别受到歧视和打击。”⁴³

更重要的是，殖民时期缅甸曾是印度的一个省，因此印侨的地位比其它外侨都要高，特别是印度人在缅甸经济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华侨经济只是三流的中介商经济，未曾控制过缅甸经济。所以，缅甸独立后殖民者和印度人主要是缅甸民族主义政策的锋芒所向，而华人政治权利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和挑战，这其中与华侨华人和缅甸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缓冲阶层印度人也是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自由同盟时期无论是同殖民时期还是后来的军政府时期相比，华人的政治权利都是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殖民时期，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同英国人、印度人相比是较低的，华人在政治上拥有非常有限的权力。如战前缅甸立法议会有103个席位，80名为民选，其余为官方圈定，8名非官方人员中有1名华人代表。⁴⁴ 华人在议会中的弱小声音，很难为华人华侨争取应有的权利。而且这种议会在缅甸政治生活中也只是象征性的咨询机构，并没有任何实权。缅甸的文官职位也几乎为印度人所垄断。所以，从参政权角度看，缅甸独立后华人拥有的权利、可参与的层面会更大些。华人有权参加总统、议员、法官的选举活动，可以担任劳工局等十五家单位的顾问和委员，行使他们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及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这比华人殖民时期的三流地位无疑是一个提高。

然而，我们在看到这一时期华人政治权利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其改善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面。殖民时期，华人在议会一百多个席位中虽只占有一席，但这种分配是殖民当局以华人作为一个族群而赋予他的，它至少表明了英殖民者对弱势华族的一种关注。但在缅甸独立后的宪法和政策中都不再有这种关注了。如1947年缅甸宪法对吉仁等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都有明确的说明，而华、印两族就没有任何提及。这说明掌权的缅甸民族主义者或者是无视华族的客观存在，或者是在有意弱化华族的政治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自由同盟时期，华人作为公民个体的社会政治地位是有所提高的，但从华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还有所下降。华人在缅甸不是作为一个族群来参政，华人的参政活动往往是他们的个人行为，就是上述内涵的逻辑表现形式。当然我们不否认，一些华人精英可以入主缅甸高层政界，维护华族的利益。但这些个人行为与华人有组织的制度性行为，对于维护华人权益的长久性、稳定性、有效性来说，二者的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发展历史表明，华人在当地谋生存求发展，如果不能作为一个族群凝聚起来发挥作用（特别是参政），很难有效地维护其政治权利。影响这一时期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本文所论述的几个方面，还有佛教、中缅邦交关系等方面也在起作用，但囿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论述。

注释：

⁴¹ 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编：《资产阶级国家法参考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9、48、76、56~58页。

⁴⁴ 田家青：《缅甸华侨的人口与分布》，1961年9月3日（仰光）《伊江周报》。

- ¹⁴ 5 移民部报告在缅甸华侨已有 6279 人入籍, 1961 年 3 月 7 日(仰光)《新仰光报》。
- ¹⁵ Mya Than, “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 132
- ¹⁶ ①陈兰生、陈孝奇编:《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旅缅甸华侨兴商总会 1951 年, 第 74 页。
- ¹⁷ ②《华商会常务理事会委派仰光高等审判厅陪审员》, 1955 年 5 月 26 日《新仰光报》。
- ¹⁸ ③《缅甸华商会第四届第一周年会务概要》, 1953 年 2 月 2 日(仰光)《人民报》
- ¹⁹ ④参见《华侨志》(总志)第 375 页;《缅甸华侨志》第 202~ 203 页;戚基耶基纽:《四个时期的中缅关系》, 第 62~ 65 页;黄绰卿:《缅甸华侨移植史概述》,《新仰光报五周年纪念特刊》第 46 页;方雄普:《朱波散记》第 204~ 205 页。
- ²⁰ ⑤²⁰ 27 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室编:《华侨情况介绍》, 1963 年, 第 25、25、25 页。
- ²¹ ⑥方雄普:《朱波散记》, 南岛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70 页。
- ²² ⑦萧维梅:《三年来本会工作报告》, (仰光)《缅甸教师联合会三周年纪念特刊》, 第 1 页。
- ²³ ⑧《教联今天举行会员大会》, 1959 年 4 月 30 日《新仰光报》。
- ²⁴ ⑨林福将:《二年来的会务概况》, (仰光)《学联二周年特刊》, 第 9 页。
- ²⁵ ⑩数据来源: 根据《各部门会员姓名录》, (仰光)《缅甸工友联合会周年纪念特刊》整理而成, 第 17~ 18 页。
- ²⁶ ⑪数据来源: 根据《仰光市区华侨机关社团名录》, (仰光)《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整理而成, 第 101~ 106 页。
- ²⁷ ⑫⁴⁰ Virginia thompson & Richard adloff, *Minority problems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9, 64.
- ²⁸ ⑬阿而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9 页。
- ²⁹ ⑭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 页。
- ³⁰ ⑮⁴² 徐四民:《伊落瓦底江的侨歌》,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87、92 页。
- ³¹ ⑯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33~ 137 页。
- ³² ⑰Maung Maung Gyi, *Burmese Political Values: the Socio-political Roots of Authoritarianism*, New Delhi Praeger Publishers, pp. 163~ 164.
- ³³ ⑱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60 页。
- ³⁴ ⑲根据“Statistics on Literacy Among Non-Europeans in Burma”, in John Leroy Christian, *Modern Burma: A Survey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 p. 352. 整理而成。
- ³⁵ ⑳貌丁昂:《缅甸史》,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出版, 第 267 页。
- ³⁶ ㉑³⁴ 卢西恩·W·派伊:《东南亚政治制度》,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95、71 页。
- ³⁷ ㉒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研究处编译:《缅甸》, 1981 年, 第 1 页。
- ³⁸ ㉓Josef Silverstein, *Burma: Military Rul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7.
- ³⁹ ㉔鲁赛尔·法菲尔德:《美国政策中的东南亚》,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181 页。
- ⁴⁰ ㉕戚基耶基纽:《四个时期的中缅关系》, 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52 页。
- ⁴¹ ㉖³⁹ 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751、751 页。
- ⁴² ㉗Josef Silverstein, “Burma” in George McTurnan Kahin, ed.,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41.
- ⁴³ ㉘Louis Walinsk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urma 1951- 1960*,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pp. 393- 394.
- ⁴⁴ ㉙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缅甸华侨志》,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出版, 民国 56 年, 第 280 页。